

司馬光與資治通鑑

刘乃和 宋衍申 主编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丛书·



吉林文史出版社

·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丛书 ·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刘 乃 和
宋 衍 申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Si M Guang Yu Zi Zhi Tong Jian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刘乃和 宋衍申 主编

责任编辑：于永玉

封面设计：姜 凡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12 $\frac{1}{8}$ 印张4插页271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6年 12月第1版 1986年 12月第1次印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3,45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1437·56

定价：2.45元

R107/21

前 言

一九八四年是我国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周年。九百年来，研究这部巨著的学者，代不乏人，论述如林。解放以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资治通鉴》的整理工作，早在一九五六年，就由十二位专家组成“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进行了工程浩大的标点、校勘，并先于二十四史出版了标点本。标点本《资治通鉴》问世后，无论对深入研究还是对广泛普及都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多年以来，学者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部巨著及相关的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研究，这种研究与封建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家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勿庸讳言，由于曾经为害成灾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使这部巨著的进一步研究和整理工作受到了损伤，涉足于《资治通鉴》研究的学者也寥若晨星了。近年来，我党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学术界思想大解放，致力于这部巨著研究的同志逐渐多起来，他们遵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做出或正在做出不少卓有见识的研究成果。形势喜人，形势也鞭策着人。

有鉴于此，我们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一九八四年八月中旬在长春市召开第五届学术年会，就以纪念《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周年为中心，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会者不仅有老一辈《通鉴学》专家，更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尽管在讨论中见智见仁，各有轩轻，但是都能畅所欲言。这次学术讨论会，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

以《资治通鉴》的学术讨论为中心，规模最大，思想最活跃的一次盛会。

向大会提交的有关《资治通鉴》及其作者司马光等的研究论文四十余篇，近百万字。我们无力将这百万言公诸于世，只能选其少数编辑成集。吉林文史出版社慨然承担出版之责，我们两人受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的委托负责主编。

我们用了近三个月时间，对四十余篇论文逐篇进行了审阅、研讨，最后选得二十三篇，定名《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在遴选过程中，并不求统一见解，只要材料扎实，言之成理就可入选，对有创见者则予以优先。我们也对若干篇章提过修改意见，但在见解和主张上则完全尊重作者本人的意见，所以摆到读者眼前的，确实是一本各抒己见的论集。

当我们编选这本《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丛论》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资治通鉴〉丛论》也是由我们两人主编的，作者中的多数人也是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会员，所以，凡是那本论集已经论述过的问题，此集原则上不再选入，但是论述的问题相同而材料见解并不相同者不在此限。所以，我们可以说《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丛论》是姊妹篇，这两书能否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则有望读者评论了。

刘 乃 和

宋 衍 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 《通鉴》、《胡注》和《表微》……………刘乃和（1）
- 对于《通鉴》研究的想法……………施 丁（8）
- 应当继承司马光认真负责的精神……………杨翼骧（13）
- 试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宋衍申（18）
- 论司马光的哲学思想……………赵吉惠（39）
- 论司马光经学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姚瀛艇（59）
- 司马光政治实践简论……………罗家祥（74）
- 司马光论君道析……………陶懋炳（88）
- 司马光的才德观……………崔凡芝（107）
- 试论司马光的民族观……………木 芹（124）
- 《宋司马光通鉴稿》研究……………邬国义（144）
- 《通鉴目录》初探……………汪受宽（175）
- 从《通鉴考异》看司马光求实精神
——司马光史学思想研究之二……………仓修良（199）
- 再评《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季 平（231）
- 《资治通鉴》刊刻出版考……………高振铎（255）
- 《资治通鉴》开篇和战国时代的上限……………孙斌来（274）
- 《通鉴》“晋纪”长于《晋书》之十六国史录……………冯君实（285）

- 《资治通鉴》的文学艺术特色……………颜中其 (304)
- 《资治通鉴》与编年体……………来可泓 (325)
- 试论司马光与编年体——兼谈《资治通鉴》
与《通鉴纪事本末》……………许在全 范传贤 (347)
- 《通鉴》卷二七七第五十条《考异》
引《实录》东丹王奔唐辨证……………宋 抵 (364)
- 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一则……………吕友仁 (373)
- 附：
《资治通鉴》究竟附有多少史论？……………宋衍申 (375)

《通鉴》、《胡注》和《表微》

刘 乃 和

今年是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周年，明年是胡三省《通鉴注》写成七百周年，也是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写成四十周年。《通鉴》成书二百年后，就有人为他写出注释，《通鉴注》写成六百六十年后，胡三省的情况才被人认识。

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有价值的、包括时间最长的编年史巨著。

在编撰《通鉴》前，司马光独自撰修了一部编年史书，内容自战国至秦共八卷，名《通志》。进呈英宗后，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英宗命他继续编撰，特命他自选助手，设立修书局于崇文院，允许他借阅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图书。这是修《通鉴》之始。但当时尚无《通鉴》之名，称为历代君臣事迹。次年十月，神宗继位，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之写了序文。此后十数年间，司马光无论是在京都为官，还是远离朝廷，都以修《通鉴》的书局自随。到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修毕，总计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由于司马光不赞成实行新法，在修书过程中，他受到不少冷语谗言，他自己曾说在“十九年中，受了人多少言语陵藉”，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仍坚持修书不辍，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他总是夜以继日的在工作着，他在《进通鉴表》

里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真是象他自己所说的“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了。他于书成后二年死去。

二、“吾成此书，死而无憾”

《通鉴》这样一部巨著，所引史事和涉及到的有关地理、典章制度等，有不少难解的地方，所以很需要注释。胡三省作注之前，曾得他父亲启发，《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他父亲笃好史学，在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时，“患鼻衄，读史不暂置，洒血渍书，遗迹故在”。他父亲对他说到为《通鉴释文》刊正事：

《通鉴》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而世不传。《释文》本出于蜀史炤，冯时行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与炤本大同小异。公休于书局为检阅官，是其得温公辟咄之教诏，刘、范诸公群居之讲明，不应乖刺乃尔，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对曰“愿学焉”。

从此他即有注《通鉴》之志。两年后，即淳祐五年（1245年），他父亲逝世，虽然他“尽瘁家蛊，又从事科举业”，但这时他对史学仍“不敢废”。到宝祐四年（1256年），他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同登进士科，后来才得“大肆其力于是书”。此后不管在何处作官，总是随身带着注释工作，他自己说是“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

《通鉴》到南宋时，通行的释文有三家：

1. 司马康《释文》，刻于海陵（泰州），故称海陵本。司马康是司马光之子，字公休。《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二十卷，

《宋史·艺文志》作六卷，现不存。

2. 史炤《释文》，《书录解题》和《宋志》均著录为三十卷，今存。

3. 蜀费氏本《通鉴音释》，附正文下，今存，有残帙。

据胡三省考证，以上一、三两本都是书估请学究所作，海陵本冒托司马康，费本则间附自己意见，都是抄袭史炤《释文》而来。而史炤《释文》错误很多。

鉴于《通鉴》释文的这种情况，因此胡三省下决心为《通鉴》重新作注。开始注释是按陆德明《经典释文》例，作《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广注》和《论》中已是略叙自周朝至五代的兴亡大致。

咸淳六年（1270年）后，他在临安延平廖公家时，警校《通鉴》教授廖公子弟，著《警校通鉴凡例》，今其例不传。后廖公将他推荐给贾似道。德祐元年（1275年），他“从军江上，言辄不用，既而军溃，间道归乡里”。次年，由于浙东骚乱，在辗转避乱中，他所注的《通鉴》稿全部散逸失落。乱后，他又重新注释。这次注释，他是用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前所刻的燕京兴文署新刊本作底本，因为这个版本当时最通行而且容易得到。元朝末年刻胡注时，亦用此本的正文。光绪《宁海志》载有胡三省子幼文所撰其父墓志，其中有“旧注《通鉴》，中经散逸，购求他本为注”，所言他本，即指元兴文署本。

此后，他亲手抄录注释，无论“祁寒暑雨”注释工作不辍。他的孩子因他年事已高，劝他不宜如此劳累，他说：“吾成此书，死而无憾”。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冬，全书注释完毕。书成后，又经十六七年，在这十六七年里，他又不断修订。至大德六年（1302年）逝世，年七十三岁。重注

时，才将《通鉴考异》和他自己的注释散入《通鉴》原文之下，这就是今天流传的本子。

胡三省注《通鉴》前后三十年，前二十年的注释初稿，遭战乱全部逸失；重新注释，又历十年。后十年曾留鄞袁桷塾中，在袁氏塾仍每天抄写鉴注定稿。至元二十六年，又遭战乱，为了避免稿件再次损失，他把撰著藏在石窖中，才免于毁损。全祖望《鲇埼亭集》有《胡梅硎藏书窖记》曾谈及。胡氏所居涧旁多古梅，因称为梅硎。

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胡氏结合各代各家注释《汉书》情况，曾谦虚地谈到他所作的注释说：

呜呼！注班书者多矣，晋灼集服、应之义而辩其当否，臣瓚总诸家之说而驳以己见。至小颜新注，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苏、晋之剖断盖鲜，譬臣瓚以差爽，诋蔡谟以牴牾，自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复遗恨；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

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

在十七史中，前四史虽有旧注，注释《通鉴》并非都能采用，至于以下各史，则都无注释。要为这样一部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多达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做注，难度相当大，工程是非常艰巨的。

《胡注》所包括的内容，他自己说：

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

在他注释《通鉴》的同时，并将史炤《释文》的“舛谬”，悉为之纠正，因海陵本、费本释文与史炤本多同，所以

也一起为之辨误，写出《通鉴文释辩误》十二卷。

《胡注》精于校勘，注《通鉴》名为音注，实为校注。原书难解，都为注释考证；原书有误，多加校勘纠正。对书中的有关典章制度、音韵训诂，都有注解，对官制变化、地理沿革，考证尤详。注释对《通鉴》的阅读、理解帮助极大。可以说《胡注》和《通鉴》同样是精深博大的巨著，故袁桷《祭胡氏文》称《胡注》为司马氏功臣，信为不虚。

三、“学识的里程碑”

胡三省是南宋史学家，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死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宋亡，入元不仕，在环境艰苦、图书困难的情况下，隐居山中注书，很少与外界来往。因为他曾亲眼看到宋朝的政治腐败，亲身经历了南宋的灭亡，又身处异族残酷统治之下，心情悲愤异常，所以在《通鉴》注释里反映出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但在当时条件下，他不能直接表达，只能隐晦流露，他的爱国心情，长期未被后世治史者所注意，因此，这位南宋爱国史学家的真实情况，几百年间无人知晓，很少人知道他的身世，更无人了解他的思想。到了清朝，虽已有人偶然提到他，但也只是认为他擅长地理和考据，对他注《通鉴》的真意，则无人注意，无人研究。

陈垣老师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人统治着的北京，当时他在极端黑暗中生活，真是渡日如年。这时辅仁大学师生屡遭迫害，自己更是经常受敌伪汉奸的威胁逼迫，精神极端痛苦。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情下，阅读《通鉴》时，很敏锐地发现在《胡注》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的亡国遗民不忘恢复

的思想。他决心要考查个究竟，因此他把《胡注》从头到尾，反复钻研，感到《胡注》所写，与自己思想每有相通之处，每当读到伤感悲愤之处，他往往感触万千，痛恨自己祖国的山河破碎，不忍见沦陷区百姓的惨受欺凌。他经常独自对书长叹“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他更深地体会了胡三省“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他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思想，以及胡三省注《通鉴》的原因和注释时如何表达其自己的意志等方面，作全面研究，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以表出《胡注》之微，以阐发《胡注》之隐，从此长期被埋没的爱国史学家胡三省的生平抱负和学术情况，才公之于世，大白于天下。所以我们可以说《表微》实堪称为《胡注》的功臣。

此书共用《胡注》精语七百五十多条，引证书籍二百五十余种。全书分二十篇，前十篇讲史法，后十篇讲史事。书中不但详尽地介绍和阐发了胡三省的思想、学术等方面，而且对研究历史的基础知识也多有所论述，对于从事史学研究有很大帮助，对研究《通鉴》和《胡注》都是重要的参考著作，尤其重要的是：无论言史法或言史事，都结合着《胡注》的议论和所表达的事件，来发挥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社会思想，以控诉日寇残暴，痛斥汉奸无耻，宣扬民族气节，表达爱国思想。把他在敌人铁蹄下过活时的沉痛心情，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抗敌必胜的坚定信心，都用经过深思熟虑的、巧妙的、他所特有的笔法，隐晦但又公开地表达出来。

这部书反映了沦陷区爱国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流露出沦陷区人民对祖国的深切怀念，也是他自己后期史学著作的丰硕成果，是他留给后学的宝贵遗产。

由于他当时在北京的险恶处境，时时有被迫害、逮捕的

可能，因此他不知道这本著作能否在他生前出版，不知道自己能否看到胜利，所以在他撰写这书的过程中，曾嘱咐过我：如果他不能看到抗战胜利，将来要我设法告诉祖国、告诉社会，他写《表微》的目的。他一生虽有千千万万的学生，但在那最黑暗、最困难的日子里，却只有我一人一直在他身边，帮助他查找和核对资料、抄写稿件等。当时我家虽因有人在解放区，一直是被敌特注意的重点户，但当我听了他的嘱托后，紧记在心，准备到了紧急关头，也要设法把他的意思传达下来。

此书1945年7月完稿，抗战胜利后得以出版。解放后重印，他认为这书是他未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所写，只能看做是他“学识的里程碑”。只是因为这时他年事已高，又因忙着学习理论著作，并积极参加历次政治运动，他自己说是在“政治补课”，因此未能再多做研究工作。

此书写成后，他不仅庆幸亲眼看到侵略者的失败，并亲自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而且经过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改造思想，在他七十九岁高龄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这是他一生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的光荣归宿。

今年是《通鉴》成书九百周年，明年是《胡注》写成七百年和陈垣老师写成《通鉴胡注表微》四十周年，特写此文一并纪念。

对于《通鉴》研究的想法

施 丁

《通鉴》以其杰出的史学成就，在我国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九百年来，阅读它而加强历史修养者相继不绝，学习它而进行编撰历史者一度很盛，研究它而评论史学得失者不乏其人。尽管它是一部打上封建烙印的史书，但是近几十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它，组织力量予以校点出版；人民仍然阅读它，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营养；学者重新研究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这说明我国人民珍视这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四化”的洪流中，我们如何认真地研究这部历史名著？如何推陈出新？我想就此问题谈几点意见：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们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能打开古代史学宝库的钥匙。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通鉴》与通鉴学，如对于《通鉴》的史学思想、《通鉴》编写的分工、通鉴学的发展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将《通鉴》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促进了史学史的研究。今后，我们当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衡量《通鉴》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在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上，是否可以考虑宏观与微观结合，深入进行比较研究。

如将《通鉴》放在我国史学和历史的长河中考察，那么它在史学史和历史上的贡献、地位和影响等等究竟如何？例

如,我国学者凡提起古代史学,往往言及“两司马”。“两司马”的提法,大概无人置疑,但具体的理解恐怕就不大一致,有的理解为地位均等,不分高低;有的理解为只是提两个代表人物,并无轩轻之意;而实事求是地研究,该是如何呢?这就要求从宏观方面,将两司马摆在史学发展中进行必要的比较研究。比较的内容,可小可大,可以是编著体例,也可以是史学思想,或历史文学;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个别的,但必需从大处着眼,从整个史学史的角度来观察《通鉴》。而且还要注意两司马在封建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我国古代的大历史家,往往是政治家、思想家、博学家,不仅代表一定的史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或反映一定的历史或历史的某个侧面。两司马就是如此。因此,仅仅研究两司马的史学是不够的,还要同政治、思想、文化等历史内容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

又如将《通鉴》放在北宋的史学和历史的环境中考察,研究它在宋代史学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宋代史学是比较发达的。在我国古代史学上,宋代的史体、史评、史考等无论哪个方面,都有一定的特点;而在这些特点中,《通鉴》与其它史学相比,有共同点也有自身的特点。在《通鉴》研究中,我们若将它与当代史学进行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会更有利于判断它的史学贡献和地位。以往在《通鉴》研究中,已注意到这一点,但尚未深入。对于史评,一般仅是注意《通鉴》中的“臣光曰”,而注意整个北宋史评较少,将“臣光曰”与北宋史评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尤少。其实,北宋的史评在中国史学史上是较兴盛的,有特点的,“臣光曰”在北宋史评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而欲了解“臣光曰”的特点,就非得深入地进行比较研究不可,否则,只能得到一般的认

识，作出一般的结论。对于史考，一般仅是注意《通鉴考异》，而注意整个北宋史考较少，将《通鉴考异》与北宋史考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尤少。其实，北宋的史考，在中国史学史上是较进步的，有特点的；《通鉴考异》在北宋史考中既有个性也有共性，既有高明之处，也有不足之点。而欲了解《通鉴考异》的特点，就非得深入地进行比较研究不可；否则，也只能是一般的认识，作出一般的结论。宋代历史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还是在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宋代历史都有一定的特点和影响；而《通鉴》作者司马光在这段历史中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研究作为一个大的历史家和政治家的司马光，非深入研究北宋历史及司马光在此历史中的作用不可；不注意这一点，或只是大概地谈谈，恐怕也难得出准确的结论。

还可将《通鉴》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一方面内容，或是某一段落的文字）仔细分析，再将它与其它史书有关的内容进行比较，考察其材料的取舍、文字的剪裁、观点的表白等等著述特点。《通鉴》写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有近三百卷的篇幅，参考了数百种史籍，若是一个个仔细分析和比较研究，必有困难，且亦失之烦琐。若是抓其要点（如写某个突出的历史人物，或写某一著名的历史事件），有所选择（如选《通鉴》唐纪与两《唐书》所写唐史，或《通鉴》五代纪与两《五代史》所写五代史，或《通鉴考异》与《新唐书纠缪》所考唐代史实），过细地比较研究和分析一下，对于认清《通鉴》的特点和价值将更为有益。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通鉴》研究中就不可笼而统之，求个大概了事；而应当注意《通鉴》的各种历史联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才能得出可靠的